

世界名人丛书

英迪拉·甘地传

〔印〕因德尔·马尔豪特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名人丛书

英迪拉·甘地传

〔印〕因德尔·马尔豪特拉 著

施美华 伯工 士平

王燕 黄燕芬 曹雪寒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Indira Gandhi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89

根据伦敦霍德和斯托顿出版公司 1989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孙 敏

英迪拉·甘地传

[印]因德尔·马尔豪特拉 著

施美华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编:100005)

北京东远电子技术公司照排部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79000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012-0505-1/K · 108

定价:5.60 元

出版说明

英迪拉·甘地是世界著名的女政治家。本书作者以印度复杂的政治、社会、宗教等矛盾为背景，全面介绍了她的生平、主要政治活动及个性。英迪拉出身于印度的名门望族，完成学业后开始在印度政坛崭露头角，1959年任国大党主席，1966年任印度总理。此后她曾3次在大选中获胜，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她的政治生涯经历了许多曲折。她宣布实行的紧急状态法遭到诸多非议，国大党因此分裂，她本人也在1977年大选中惨败。血洗金庙事件后，印度的种族和宗教对立急剧激化，英迪拉被其锡克警卫刺杀。

本书作者为印度著名记者，与英迪拉的私人关系较密切，故书中有许多第一手材料，对于了解英迪拉其人及印度政治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总的讲，作者对英迪拉的评价较为客观公允，但在涉及印度对外关系时有些观点难免失之偏颇，读者阅读有关章节时对此当加以鉴别。

目 录

前 言	1
1 清晨的悲剧	5
2 无价遗产	17
3 冒天下之大不韪	41
4 父亲的管家和密友	55
5 夏斯特里插曲	80
6 呆女人	93
7 通向权力巅峰的捷径	112
8 黄金时刻	138
9 凄凉的下坡路	152
10 紧急状态，不可饶恕的罪行	178
11 家族中的女家长	197
12 下野	209
13 东山再起	220
14 从胜利到悲剧	235
15 王朝至上	252
16 长长的阴影	268
17 祸不单行	302
18 致命的枪声	323

前 言

有关英迪拉·甘地的书比写她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位17年的开国总理，印度现代史上更为杰出的人物）的书还要多，一个显著的原因就是她的政治生涯的高度戏剧化。她奇迹般地登上统治巅峰且深孚众望，旋即出人意料地滑下低谷，尔后再度急速崛起。不到4年后的1984年秋天，一次暗杀突然结束了她的生命。

问题在于那么多有关英迪拉的书和出版物中，大部分是在她饱经沧桑的一生中位于巅峰或低谷时出版的，其间仅仅几年之隔。70年代早期，英迪拉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印度又获得印巴战争的胜利，孟加拉获得解放。此时，大量的传记连篇累牍地颂扬英迪拉，她被捧上了天，完美无瑕一如印度教万神之中的万能女神杜尔加。70年代后期，她于1975年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导致印度的民主被中止了19个月，从而遭到选民的反抗而在选举中失败，此时大量书籍又如山洪爆发，本本都以最刻薄的笔调把她描绘成无可救药的恶魔。在某些情况下，所有这些著作，无论对英迪拉是颂扬还是谩骂，其作者都是一个类型。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许多年过去了，至今印度仍有许多人顽固坚持对英迪拉的两极评价。她不是受人崇拜便是横遭唾骂，几乎没有人客观地看待她。在此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咒骂她的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上阶层，而颂扬她的则是广大的下层人民。

1980年1月，英迪拉重返政治舞台，几部仓促写就的书籍又

一次将她当成偶像捧了出来，同时出版的几部关于痛苦的旁遮普和锡克少数民族问题的书又把她说成是吃人女妖。我写本书的目的在于要突破她不是圣徒便是恶魔的局限，完完全全而非支离破碎地展现她的人生经历，尽可能地做到客观。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即使在今天的许多印度集会中，仅仅提及她的名字就会招致铺天盖地的谩骂和仇恨。但是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英迪拉的个人和政治传记也是一部印度历史，至少是她执政的20年（包括她在野的几年）间的印度历史。

英迪拉的父亲领导独立的印度政府之后不久，她便成了他的女主人和最可信赖的朋友，我也有幸从近处亲眼目睹了许多事件，这在书中都有描述。我还有幸认识英迪拉·甘地，尽管不敢妄称是她的朋友或很了解她。她内向，保守，朋友极少，即使她的朋友也不敢夸口了解她，因为她很少坦露内心世界。

然而我确实了解她。50年代中期我开始认识她，最初是通过我的一位朋友，也就是他的丈夫费罗兹·甘地。当时我是《政治家》报的特约记者。1964年5月她父亲去世时，我已是该报的政治记者兼新德里新闻局局长，此后的18个月中，英迪拉在继承尼赫鲁任总理的夏斯特里内阁中担任新闻和广播部长，我也能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她。她认为总理对她不够重视，对此极为不满。其时，很少有人做她的常客，唯独我除外。这也许可以说明以后我容易接近她的原因，即使在1966年1月她荣任总理以后也是如此。

1967年底我转至《政治家》报总部加尔各答工作，1971年又移居孟买，并加入《印度时报》工作。即使如此，在我去德里或英迪拉来到孟买时，我仍然能经常见到她。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紧急状态令的颁布。那时我没法再去看她，她也不像过去那样叫我过去。1978年我作为《印度时报》的常驻记者返回德里，此时她已下野。人民党政府决定传讯她，要求解

释紧急状态令期间的过激行为，但此举却导致了一场仇杀。又是最先有机会拜访她，旧的联系得以恢复。

在这本书中，我记载了约 30 次与她之间的谈话，没有他人在场，别处也没有任何记录，此外还有约 30 次她与几个人（我也在场）之间的讨论，其内容可由其他参与者证实或质疑。至于单独会见的准确性，我能提供的唯一保证就是我担任本国的《政治家》及《印度时报》、英国的《卫报》的记者和评论员的档案材料。

读者有权提问，为什么我称呼她英迪拉而非甘地夫人。原因不在于我要借此表示与她亲近，而纯粹出于实际需要，如果是甘地或甘地夫人则将引起无穷的混淆。比如甘地就有可能被误认为与英迪拉毫无关系的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她和她的两个儿子——继位的拉吉夫和 1980 年去世的桑贾伊——之间就更容易混淆了。即使加上“夫人”一词也无济于事，因为她的两个儿媳，她所喜爱的拉吉夫之妻索尼娅以及和婆母不和的桑贾伊遗孀玛耐克也经常在书中出现。

书中任何结论或见解，除非特别指出属于某人，都由本人负责。但仍有很多比我更了解英迪拉，或者与她有政治或官方联系的人，他们知道一些仍属于机密的情况，并给了我极有价值的帮助和建议。他们帮助我从虚幻的传说中筛选事实，正确看待那些鲜为人知的发现，不明确的线索和拜占庭式秘密。太多的人帮助了我，要分别感谢他们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正如所发生的那样，他们中有许多人，包括英迪拉的密友与支持者，都敌视英迪拉，其比例之大令人惊奇。那些在她死后才对其渐渐产生好感的吹毛求疵者申明只有在透露姓名的情况下，才予以合作。我最感激的是那些允许我透露姓名的人。尤其是普普尔·贾亚卡，P·N·哈克萨尔，谢尔达·普拉萨德，杰哈，他们不惜花费许多宝贵时间，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没完没了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杰哈在本书付梓前不幸去世了。

我也十分感激拉古·拉伊和维伦德拉·普拉巴卡尔，他们允

许我采用他们所拍摄的英迪拉的精彩照片；我也感激印度政府，特别是情报官员拉姆汉·拉奥同意我使用印度新闻资料局珍藏的有关图片；感谢《印度时报》同意我印刷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照片；感谢英迪拉多年的特别助手达万，是他毫无保留地提供私人影集并同意复制他的《印度女王》中英迪拉的漫画；在此我对他们深表谢意！

我埋头写书，常常因为进度推迟而对家人大发雷霆，但他们却忍受了我对他们的忽略，对我总是笑脸相迎。儿子阿里不断从纽约来电话询问我的进展情况。如果进展不大，他也表示不安。妻子雷卡更是首当其冲地忍受我的种种考验。如果没有她的爱、她的支持、她的督促和劝导，我将无法完成此书，即使侥幸写成，其篇幅也会相当短。本书对于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补偿。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

清晨的悲剧

1984年10月31日，一个阴冷的早晨。英迪拉·甘地——在连续的18年中（其间仅有3年除外）执掌印度总理大权，堪称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用完了包括水果和烤面包片的早餐后，便走出了萨夫达尔路1号官邸的边门。这条路绿树成荫，是新德里——半个多世纪前由英国人建造，印度殖民地的首都——戒备最森严的地区。

英迪拉·甘地娇小苗条，非常漂亮，很能让人联想起在她精心培育的花园里盛开的鲜花。她像往常一样，轻捷地穿过一条走廊，走向毗连官邸的阿克巴路1号中的办公室。尽管她的官邸和办公室曾一度隔开，但多年来它们大多数时间里是一座综合建筑物的一部分，中间只有一道篱笆，并开一个小门供进出之用。

只有极个别场合，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英迪拉故意使自己衣衫不整，鬓云蓬乱。一般情况下，她总是穿戴整齐，头发一丝不乱。今天，她即将参加一个电视招待会，就更加留意自己的衣着、容貌与发型。招待会是应英国剧作家、演员、幽默作家彼特·乌斯季诺夫先生之请而举行的，地点选在阿克巴路办公室外的草坪上。她曾听说橘黄色在电视屏幕上效果很好，于是特意挑选了条这种颜色的纱丽。可她是否也知道，在印度教尤其是在锡克教的信仰中，这种颜色更是殉道的颜色呢？恐怕已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为了上电视，英迪拉披上了橘黄色纱丽，出于同样的原因她

脱下了防弹背心。事实上，她穿防弹背心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最近一段时间来，威胁她生命的事件不断发生。6月份她命令军队占领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城的金殿后，威胁其生命的事件更是有增无减。阿姆利则金殿被锡克教徒奉为最神圣的殿堂，而这里已经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所谓独立于印度之外的锡克家园“卡里斯坦”的堡垒和指挥部。

今天，英迪拉不仅脱掉了防弹背心，也因为时间太紧，免去了一个重要惯例，该惯例可以追溯到其杰出的父亲执政时期。每天早晨，总理的家对外开放近一小时。此时，成千上万的人群，其中包括最最贫穷的老百姓，都可以向总理呈交请愿书，叙说自己的不幸；或者仅仅看一眼总理，便觉得百倍荣耀。

正像那些公正客观的观察家们所证实的，英迪拉之所以命令军队把恐怖主义分子驱逐出金殿，决非源于对锡克教徒——一群她倾注了极大爱心的人们——的仇恨。但是一般的锡克教徒和极端主义分子、恐怖分子却不这样认为。

绝大多数锡克教徒，包括4年前欢呼英迪拉重返政治舞台的锡克教徒都认为，造成惨重伤亡并大面积破坏了金殿这一神圣地区的军事行为，“不能容忍地亵渎了”他们心目中的最神圣殿堂。锡克教徒的普遍愤怒滋养了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发誓一定要复仇。于是，对总理本人、对她的儿子或孙子生命的威胁时有发生。

仅仅48小时以前，就在东部的奥里萨邦举行的大型公众集会上，英迪拉还提起过她被谋杀的可能性。但她接着说：“这样的事情并不让我担心。因为当我死时，我的每一滴血都会滋润国家，增强一个统一的印度的力量”，听众无不为她们的话欢呼。他们的欢呼并不是因为相信她的死就在眼前，而是出于对这位貌似柔弱的女性所表现出的勇气的钦佩之情。

但是，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英迪拉的内心。当晚进餐时，她曾对东道主奥里萨邦长比沙姆勃·纳特·潘迪提及此事，她说她曾亲眼看着母亲、祖父和父亲痛苦地死在床上，而她希望能站着

死去。然后，她获悉孙子遭遇车祸，便缩短在奥里萨邦的逗留时间，提前匆忙地返回德里的家中。在她看来，这次车祸有可能又是恐怖分子对他们生命的一次威胁。

一分钟后，英迪拉来到了小门，她对警卫本特·辛格微笑着。本特是锡克教徒，担任她的贴身保镖已经9年，而且多次随她出访国外，今天正好轮到他值班。辛格从左轮手枪里射出了一串子弹，击中英迪拉的腹部，回答了她的微笑。她笔直地倒下，另一个锡克教徒萨特万特·辛格又把斯顿机枪中的子弹全部射进了英迪拉的躯体。

恐怖的两分钟过后，一切都结束了，时钟指在10点9分。戒备森严的总理府内每个人都被惊呆了，须臾间又是一片混乱。所有的官员、卫兵，包括那些首先想到逃命的人，尖叫着、谩骂着，到处乱跑。就在人们目瞪口呆的同时，本特·辛格把步话机挂在篱笆上，举起双手，“我已经完成了使命，现在随你们的便吧”，他代表锡克教徒为金殿遭到的粗暴亵渎复了仇。担任外围警戒任务的都是从印度—中国边界的边防警察中特别挑选出来的，他们包围了本特和萨特万特，把他们赶进一间安全小屋。据称，他们在混乱中企图逃跑，遭到枪击，本特被当场打死，萨特万特受重伤，以谋杀罪受审，1989年1月被执行死刑。

8码以外的彼特·乌斯季诺夫听到了恐怖的枪声，它打破了美丽花园中的宁静，结束了英迪拉的生命，后来他这样回忆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麦克风和摄影机，一位秘书已去接她，但是事情发生了。我听到3声枪响，觉得非常奇怪。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一定是在放鞭炮。紧接着又是自动枪声，开枪者似乎要证实这是枪声而非鞭炮。我不认为地狱里有她的位置，还是不愿承认这是枪响。我们看到士兵在四处奔跑。他们把我们像囚犯一样关了5个小时。

安全部门急于（这一点可以理解）想弄清楚乌斯季诺夫的人是否拍下了整个暗杀过程。如果拍下了，就要没收胶卷。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回答：电视组人员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有人拍摄。但是官员们肯定是被早晨的可怖事件弄蒙了，仍然对他们无休止地进行审问检查。

早在童年时代，英迪拉就觉得自己与圣女贞德很相像。这位奥尔良少女被自己所信赖的人出卖致死，英迪拉也是被以保护她为职责的人枪杀。但是英迪拉之死与她童年时代所想象的女英雄之死还是有所不同。英迪拉曾长期统治过的政府体制的彻底腐败，不仅为滋生谋杀的初因——疯狂的仇恨提供了温床，也为不合格的安全保卫体系提供了庇护所。

比如，在那个致命的早晨，如果采取了最基本的安全措施，萨特万特·辛格就不会呆在总理宅邸的小门旁。因为他和本特·辛格呆在一起是无法想象的，违背了最基本的安全规则。

萨特万特还不到 20 岁，正处于感受性极强的年龄。而且刚刚从家乡——位于旁遮普邦吉尔达斯布尔区的一个村庄——度长假回来。这里一直是锡克教极端主义的温床。因此，他的上司有必要将他安置在总理住宅的外围，严防他靠近总理，并对他进行严格的考查，以确保他没有受家乡反英迪拉思想的影响。

本特也因为在首都的锡克神殿或礼拜场所与可疑分子接触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高级官员曾将他交给他所属的德里武装警察机构处理，但他多年来一直为总理服务，便直接上诉至总理，于是移交命令被撤销。

尽管高层安全官员们一直担心发生不幸，因为锡克教人担任安全警卫本身就是对安全的一大威胁，但这种不幸最后还是发生了。事实上锡克人群起反对金殿军事行动之初，情报局局长就曾考虑过，要将所有锡克人调离总理警卫的岗位，至少是调离一段时间。这样做会谨慎些，但是他没有将这一想法付诸行动，而是提交给总理，等待批准。

总理遭暗杀后，这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才得见天日，英迪拉只在上面潦草地画上了几个字：“难道我们不安全吗？”这就是对情报局局长的回答。但是直到那天，没人解释过为什么该文件送到了英迪拉手中。不管怎样，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要求一位需要保护的政府首脑来评判保护措施。为了对这位痛苦的情报局长公平起见，有必要在此加一句，将所有锡克人调离总理安全警卫的岗位，绝对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英迪拉建立的高度集权化和个人化的政府机制，剥夺了绝大多数有创见的印度官员的权力，这位可怜的局长当然也不敢擅自行动了。

英迪拉拒绝将所有锡克教徒调离安全警卫岗位的同时，又应拉姆杰·纳德·考——印度情报机构的鼻祖，退休后又被英迪拉请回充当她的安全顾问——之请，批准了一条规定：总理官邸和办公室内，不允许任何两名武装的锡克教徒同时值班。这应是一条不容怠慢的规定，但是萨特万特假装肚子疼，必须离厕所近些，轻而易举地逃避了它。于是渴望复仇的萨特万特及其同谋就能同时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了。

还有必要一提的是，该规定还要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总理周围都应该有保镖，以阻挡可能的暗杀子弹。这一点也被忽视了。出事的时候，英迪拉走在最前面，她最忠实的特别助理 R·K·达万走在她旁边，她的安全警卫却慢悠悠地跟在后边。令人惭愧的是，他们一听到枪响，就四散逃开了。

富有神秘色彩的是，英迪拉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可怕的结局。尽管威胁她生命的事件日益增加，但她的住宅和围墙之间的距离却很短。考对此非常吃惊，便请求英迪拉同意修一个草坪，加高土堆，以挡住从外面扔进来的炸弹。

英迪拉笑着让他不要担心，“如果他们要来杀我”，她说，“什么都帮不上忙的，那些本该来救我的人到时候或许会第一个溜走。”

她如此说仅仅是一种预感呢，还是意识到了她的印度政府机

构正在一天天危险地堕落下去，尽管这种意识已经来迟了一步？别人则很难以道明了。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当紧要关头来临时，事情比她所预料的还要糟得多。

她的安全工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疏忽。但当悲剧发生时，这还不是唯一可怕的疏忽。说起来难以置信，事件发生后，竟然不能为总理提供及时的医疗护理。一般情况下，萨夫达尔路1号都停有一辆救护车以供紧急之需，但当时救护车却不见了踪影，司机离开岗位喝茶休息去了。附近又没有供血站，于是严重受伤的英迪拉由达万和她的意大利裔儿媳索尼娅——她仍穿着家居服装，听到枪声后，她大喊着：“妈妈，妈妈”，从屋里冲了出来——抬进一家1954年建造的印度式建筑莫里斯·牛津里，然后被送进将近3英里之外的著名的全印度医学科学院。

由于没有人事先通过无线电告诉医学科学院所发生的一切，助理医生们看到英迪拉被抬进来，全都惊得呆若木鸡。高级医生急速赶来，将英迪拉送进手术室，放在人工心肺机上，并立即为她输血。刚开始时医生曾征求大家献血，于是聚集在医院门外的人群争先恐后，抢着为英迪拉献血。这一下更加剧了人群的混乱和躁动。从英迪拉被抬进医院的那一刻起，聚集在医学院门外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一分一分地推移，气氛也益趋紧张。

然而流入英迪拉体内的鲜血却少得可怜。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英迪拉身上的弹伤有20多处，从医学上讲，在到达医学院的时候，她就已经死去。但医生们直到下午2点20分才正式宣布她死亡的消息，尽管数小时前英国广播公司就已将这一消息传播至全世界，印度国内新闻机构也作了广播。

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听到了英迪拉遇害的消息，都禁不住失声痛哭。其中就有英迪拉唯一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他是在加尔各答潮湿的郊区打开收音机的。为了执行政党的竞选，也为了日后继承母亲作准备，他离开德里来到西孟加拉邦。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继承母亲职位的那一天竟来得如此迅速，如

此突然，如此悲哀。

那天，不在德里的重要人物不只是拉吉夫一人。共和国总统贾尼·辛尔·辛格（一位锡克教徒）甚至远在北也门的首都萨那，正在进行国事访问。听到消息，他便决定立即飞返。当日傍晚，他比拉吉夫晚了几小时到达德里。这两位重要人物不在首都，正是官方推迟公布英迪拉逝世的主要原因。

印度宪法规定，总理逝世之后，必须有另一人立即宣誓就职以避免出现权力真空。没有部长会议就不存在政府，而没有总理领导也就无所谓部长会议。宪法还规定，即使总统远在国外，也唯有他才能合法挑选新任总理（在没有代理总理的情况下）宣誓就职。近几年来，因为有些文件刻不容缓，印度有关官员总是不得不远飞国外，比如：苏联的基辅，加拿大的渥太华，以获取旅行在外的总统的亲笔签字。

紧急时期，总统的某些职权如果已经通过部长会议正式特别转交给副总统，那么唯有副总统能代理总统行使这些职权。此时，如果总理逝世的消息得到官方的承认，部长会议也就自动撤销。

谁来继位的问题又使宪法第 22 条极度复杂化。目前的局势十分需要立即将英迪拉的权力移交给拉吉夫·甘地，然而过去的实践与这种需要完全背离。英迪拉的父亲以及父亲的继任者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死于任上时，当时的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任命资历最深的内阁成员古尔扎里拉尔·南达就任临时总理，同时要求执政党依据惯例在 13 天哀悼期过后选择新的领袖。因而夏斯特里成了尼赫鲁的继任者，而英迪拉则继承了夏斯特里。

但是这一次是如此的不同，对人们的伤害如此严重，于是继承问题便一拖再拖，居然耗费两周之久，使得慢条斯理的印度也承受不起。

此外，在由议会执政党选举出一位永久性的总理之前，选出一位临时总理填补空白，即使是非常必要的，也行不通了。英迪

拉任职期间已将一切安排得严丝合缝，除了儿子以外，别无他人能继承总理的职位。为达到这一目的，她不惜大大贬降内阁同僚、部长以及党的领袖们，以便使他们无一能在继位问题上与她儿子竞争。甚至那些占据重要地位的内阁部长们的社会等级也不能幸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南达那样幸运，在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死后荣任总理一职。因而，选择一位临时继承人甚至比即将来临的永久性总理的宣誓就职仪式还要竞争激烈又众说纷纭。

因而毫不奇怪的是，议会内执政党人便顺水推舟地同意拉吉夫·甘地立即就任总理一职。英迪拉葬礼结束之后，国大党马上开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正式选举他为党的领袖。党内的资深者虽然不大乐意屈尊于这位年轻人的领导下，但也只能作如是想以安慰自己：尼赫鲁、英迪拉的超凡魅力由拉吉夫继承下来，在几个月以后即将举行的全国性选举中将是一笔巨大财富。

在从萨那至德里漫长而紧张的旅途中，总统就已经明白：除了立即任命拉吉夫·甘地为总理外，没有任何其它可行的选择方案。对贾尼·辛尔·辛格来说，能够荣任总统，实在是受惠于英迪拉。事实上，当她决定由辛格充任国家元首之时，全国上下为之震惊。许多人感到失望，而辛格本人呢，一时也是手足无措。在一次不是表态的表态中，他说：“即使夫人要求我用扫帚打扫地板，我也非常乐意去做。”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变得不愉快了，尤其是金殿军事行动之后，更是恶化到极点。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也极力反对这次军事行动，但是并没有平息锡克教徒们心中的愤怒，对他的谴责也仅次于英迪拉。其实，身任“入侵”锡克圣地的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怀有一种“亵渎神灵”的深深的“罪恶感”。

尽管如此，当他向随从人员谈及此事时，还是说他与英迪拉之间的分歧与任命拉吉夫担任总理一事绝不相干，总理一职必须根据个人的品质决定。因此，一回到德里，他便来到医学院向英迪拉致敬。然后，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让拉吉夫·甘地宣誓